

## 汪精衛「中日提攜論」研究： 思想演化與政治實踐

許育銘

### 摘要

本文旨在重新審視汪精衛「中日提攜論」的思想脈絡與政治實踐，撇除戰後所加諸的道德評價，從思想史與外交政策的角度，探討其政治選擇的深層邏輯。抗戰期間，汪精衛的對日合作並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其自青年時期即開始建構的思想體系之延伸。自留學日本以來，汪深受明治維新與陽明學的啟發，並在巴黎和會後轉向「人類共存主義」，主張以中日互助對抗西方帝國主義。

汪精衛繼承並轉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認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應在互助原則下共建東亞和平秩序。他試圖將日本提出的「東亞新秩序」導向「平等互惠」的軌道，並透過制度化宣傳與政策實踐，推動「和平救國」理念。然而，汪政權在現實中受制於日本軍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使其政治行動陷入困境。

本文透過汪精衛的思想演化、政治實踐與對孫中山思想的詮釋，揭示其「中日提攜論」背後的思想延續性與歷史意義。汪精衛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其思想與行動交織的張力，構成理解中國近代外交思想與東亞秩序重構的重要切面。本文期望藉此提供一個更具深度與複雜性的歷史視角，理解汪精衛在中日關係極端困境中所作的抉擇。

關鍵詞：汪精衛、中日提攜論、大亞洲主義、東亞新秩序



# Wang Jingwei's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Theory: Intellectu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Yu-ming Hsu\*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Wang Jingwei's theory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Setting aside the moral judgments imposed after the war,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deeper logic behind his political cho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ang's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was not an act of expediency but rather an extension of a system of thought that he had begun constructing since his youth. Influenced by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Yangming School of thought during his studies in Japan, and later turning toward "Human Coexistence Theory" after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ang advocated Sino-Japanese mutual assistance in order to resist Western imperialism.

Wang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Sun Yat-sen's "Pan-Asianism," believing that China and Japan, as nations of "shared language and race," should cooperat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building a peaceful East Asian order. He attempted to steer Japan's proposed "New Order in East Asia" toward a path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promoting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peace" by way of institutionalized propaganda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Wang regime h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war was constrain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the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led to the failure of his peace effor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Wang Jingwe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Sun Yat-sen's though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root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theory. Wang was both a product and a maker of history,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his ideas and actions provides a cri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East Asian order. This study seeks to offer a more objective and nuanc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Wang Jingwei’s choices under extreme circumstances.

**Keywords: Wang Jingwei,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Theory, Pan-Asianism, New Order in East Asia**

# 汪精衛「中日提攜論」研究： 思想演化與政治實踐\*

許育銘\*\*

## 壹、前言

1939年3月27日，汪精衛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舉一個例〉，長文逾四千字，公開回應親信曾仲鳴遇刺身亡，並藉此闡述其對中日和平的立場。汪在文中強調，對日議和並非個人意志，而是「最高機關經討論後的共同決定」，並提出「中日戰則兩傷，和則共存」的主張。他進一步指出：「只要努力，和平可奠定東亞百年安定；否則，唯有同歸於盡。」文末更坦言：「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章，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sup>1</sup> 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緊密相連的表述，令人

---

\* 本文初稿〈汪精衛與「中日提攜論」：理想、現實與歷史的交錯〉於2025年8月16日在國史館舉辦「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謹此聲明。另對投稿本刊時，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意見與肯定，致上最深切的謝意。

收稿日期：2025年8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9月24日。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sup>1</sup> 汪精衛，〈舉一個例〉，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下冊（臺北：八荒圖書，2023年），頁437。至於汪在文中透露的1937年12月6日的國防最高會議紀錄與原始文件的比對差異問題，可參閱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422-442。此外，據劉威志的研究表示，汪精衛從事和平運動之初的第一關詞〈憶舊遊·落葉〉，與其政論〈艷電〉、〈舉一個例〉相表裡，足以

聯想到清末他刺攝政王失敗被捕時，身上仍攜帶〈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等文章的歷史情景，何其相似。<sup>2</sup> 〈舉一個例〉不僅是汪精衛的政治宣言，也可視為一篇「告別國人書」，流露出其一貫的烈士心態與濃厚的歷史悲劇感。

然而，若僅以「親日」、「漢奸」等道德化評價來概括汪精衛的政治選擇，難免流於簡化。作為一位早年曾以身許國的革命志士，他為何在國難當前選擇與日本合作？其主張的「中日提攜論」究竟如何形成？在抗戰爆發後又如何發生轉化？其背後是否存在思想的延續性？這些問題構成本文的核心關懷。

汪精衛的思想歷程橫跨清末民初至抗戰時期，歷經多重轉折與延續。抗戰期間，他在面對國際秩序變動與民族危機時，心中關於「中日提攜」、「中日共存」的理念在戰時背景下經歷了重要的轉化與實踐，並與日本所推動的「東亞新秩序」產生複雜的互動與糾葛。<sup>3</sup>

---

詮釋汪氏河內時期的心境，〈舉一個例〉與〈憶舊遊·落葉〉具有緊密關係。參閱劉威志，〈汪精衛〈憶舊遊·落葉〉的作意、效用與迴響再探〉，《政大中文學報》，第36期（2021年12月），頁253-300。

<sup>2</sup> 據汪自述被捕時，「彼等在我身中檢出幾篇曾經載在《民報》之文章，彼等問我帶此為何。我說『這些文章從前用墨寫成，今則想以血寫之。』」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9年），頁218。

<sup>3</sup> 相關研究成果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近年來，國內外對汪精衛的研究逐漸突破傳統的批判框架，轉向人物傳記、文學分析與記憶政治等面向，呈現出多元且深入的學術成果。其中王克文於2001年出版的《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一書，可以作為一個研究的分水嶺。之後李志毓、楊治宜、劉威志等人的研究相較為新，分別從人格特質、政治抉擇、詩歌書寫與歷史記憶等角度，重構汪精衛的思想世界與文化形象。然而，針對本文所聚焦的政治思想與對日認識課題，舊有研究多集中於汪精衛對「大亞洲主義」的詮釋與運用，對其「中日提攜論」的專門探討則相對稀少。迄今為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來自日本學者嵯峨隆。他在2016年出版的《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中，第九章〈汪精衛の中日提攜論とその思想的根柢〉，深入分析汪精衛「中日提攜論」的思想基礎與政治邏輯。其後，嵯峨隆對該書進行大幅增補與修訂，並於2020年出版《アジア主義全史》，在第五章第三節以〈汪精衛の中日提攜論と大アジア主義〉為題，延續對汪精衛思想的探討，並進一步評價其「大亞洲主義」的理論架構與政治限界。此外，土屋光芳亦對汪精衛的思想與政治實踐進行了深入研究，特別關注其「和平運動」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化策略，並在《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與《汪兆銘政權論》等著作中，分析汪政權如何在日本主導下尋求政治自主性。土屋並編有詳盡的〈汪精衛研究文献目錄〉，極具參考價值。土屋光芳，〈汪精衛研究文献目錄〉，《政経論叢》，第90卷第3、4期（2020年3月），

在進一步分析汪精衛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對「中日提攜論」與「大亞洲主義」兩者進行基本概念的界定與區分。雖然兩者在汪精衛的政治實踐中密切交織，並常被並置使用，但其思想來源、歷史脈絡與政治功能卻不盡相同。「中日提攜論」偏重於雙邊關係的實踐層面，強調中日兩國在「同文同種」基礎上的互助合作；而「大亞洲主義」則屬於區域整合的理想性框架，源自孫中山對亞洲民族聯合抗西的倡議，後被汪精衛轉化為汪政權的外交與宣傳基礎。換言之，汪精衛根據自身早期的革命經驗，奠定了「中日提攜論」的基礎，繼而承襲並重構孫中山之「大亞洲主義」。

本文將撇除戰爭結果所帶來的道德評價，從思想史與外交政策的角度重新審視汪精衛的中日關係觀。透過分析其留日經驗、革命歷程、巴黎和會後的思想轉向，以及戰時的政治實踐，本文將探討「中日提攜論」的形成與演變，並揭示其背後的思想延續性與歷史意義。期望藉此提供一個超越單純道德譴責的歷史視角，理解汪精衛在極端環境下的抉擇及其在東亞秩序重構中的角色，並為東亞近代外交思想的研究開拓新的討論空間。

## 貳、思想的孕育與轉向： 從民族主義到人類共存主義

汪精衛於1904年啟程赴日留學，是清末中國知識分子赴日尋求救國之道大潮中的一員。當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數十年的銳意改革，已迅速崛起為亞洲的現代化強國，其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更使其成為許多中國知識青年心中，亞洲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象徵與典範。汪精衛進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主修政治學與憲法學，在此期間廣泛接觸了西方傳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新興思潮。

---

頁239-326。關於整體評價汪精衛與汪政權，中日間在認知上存在巨大齟齬狀況，參閱劉傑，〈中日關係史上的「汪兆銘研究」〉，收入黃自進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上）》（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年），頁51-86。

在這樣的思想洗禮下，1905年，已經加入同盟會的汪精衛在《民報》撰寫〈民族的國民〉一文，這部作品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早期代表作。<sup>4</sup> 汪在文中深入闡述了中國民族國家的理論構想，強調種族、民族與歷史的統一性對於建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汪認為，中國欲圖存，必須從舊有的王朝概念轉變為現代的民族國家，而民族的凝聚力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另一方面，汪精衛藉由《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展開的關於中國適宜君主立憲還是共和制的論戰，讓其一舉在全國讀者間知名，讀者之中甚至包括蔣介石與毛澤東。<sup>5</sup>

在日本期間的親身見聞，對汪精衛的政治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俄戰爭爆發後，他近距離觀察到日本社會上下動員的決心與效率，對此感到震撼。他對西鄉隆盛、勝海舟等明治維新時期的「志士」們十分崇敬，他們的為國犧牲精神、果斷決策與務實作風，在汪精衛內心形塑「志士精神」的理想人格。<sup>6</sup> 這種強調為國犧牲的志士精神，對他日後的革命行動產生深遠影響。

胡蘭成，作為汪政權時期的親信幕僚與戰後備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在1979年於日本出版的《日本及び日本人に寄せる》書中有一文〈汪精衛的梅花之句〉，評論了汪精衛及南京政府當年事，並對汪精衛的政治人格與歷史定位進行了深刻反思。胡將汪精衛譽為可與日本「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比擬的「志士」人物，認為汪並非僅僅順應現實的政客，而是以深厚的文化情操與歷史感進行政治選擇。<sup>7</sup>

<sup>4</sup>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表示，汪精衛的文章具有奠基性的意義，不僅因為它影響深遠，而且因為它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循環話語的三要素（種族、民族及歷史）重建成一個系統性的民族主義學說。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3-25。

<sup>5</sup> 楊治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4年），頁74-77。汪精衛在論戰中運用在日本所學的政治學等理論情況，可參閱孫宏雲，〈汪精衛、梁啟超“革命”論戰的政治學背景〉，《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2024年10月），頁69-83。

<sup>6</sup> 雷鳴，《汪精衛先生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20。上海書店是根據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影印，收錄於《民國叢書》第1編第88卷。

<sup>7</sup> 胡蘭成：「把辛亥革命來比作明治維新，除了早死的黃興，最是汪精衛可比西鄉隆盛。胡漢民似大久保利通，蔣介石好比山縣有朋，此外還有一人，黃郛恰如坂本龍馬。」〈胡蘭成晚年對汪精衛及其南京政府的最後結論〉，收錄於「新世紀」：<https://2newcentury.net>。

胡蘭成指出，汪政權的政治失敗，部分源於其追隨者與汪之間的「經驗代溝」。他認為，汪精衛所屬的一代人曾經歷清末民初的思想激盪，從漢學走向西學，並以此作為對抗外侮的思想資源；而追隨汪精衛的年輕一代則是從西學返回漢學，在文化認同上產生迷惘與斷裂。胡坦言：「與汪精衛一代的志士不同，我們沒有接受對明治維新與日俄戰爭的感激的洗禮，接受了學校教育，甚至連王道亦無法明白。孫文與汪精衛的一代志在從漢學到西洋知識以尋求對抗，我們這一代是從西洋知識返回到漢學則多有迷惑，雖有志，卻無歷史的行動來實證。我自己無法觀照那個時局的進展，對所見事物沒有令人感動的見識亦在所難免。」<sup>8</sup> 又言：「作為中國的有志之士，談不上對日本明治維新與日俄戰爭持感激之心，只知對日議和對兩國是明智之舉。」<sup>9</sup> 由此可見，汪精衛思想的形成與其早期留日經驗密不可分。

當時許多留日或「亡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關心日本明治維新與陽明學的關係，將陽明學作為維新或革命的形象。<sup>10</sup> 汪精衛也深受日本盛行的陽明學影響，特別是汪精衛與陳璧君共譯的里見常次郎《陽明與禪》一書中「良知無生死」的說法。<sup>11</sup> 這一思想使他將革命視為一種超越生死的道德實踐，一種基於內在良知的覺醒與行動。這種精神上的昇華，為他日後無論是捨生忘死的暗殺行動，抑或是飽受爭議的「和平運動」，都賦予了一層深沉的道德自洽性。

汪精衛對陽明學的接近，部分源於家學淵源。他在1933年寫的自述中曾提到，自幼便在父親的要求下誦讀王陽明的《傳習錄》，這也是他早年記憶中唯一

---

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 (2025/7/5點閱)。

<sup>8</sup> 〈胡蘭成晚年對汪精衛及其南京政府的最後結論〉，收錄於「新世紀」：[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 (2025/7/5點閱)。

<sup>9</sup> 〈胡蘭成晚年對汪精衛及其南京政府的最後結論〉，收錄於「新世紀」：[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 (2025/7/5點閱)。

<sup>10</sup> 「以這種形象來認知陽明學的，莫過於近代中國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及革命派的孫中山與蔣介石等人。」張崑將，《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236。

<sup>11</sup> 關智英，〈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收入楊際開、伊東貴之編，《「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互還流》（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年），頁335。

明確提及的書籍，影響深遠。<sup>12</sup> 由此可見，汪自小便熟悉陽明學的核心觀念，如「知行合一」與「致良知」。<sup>13</sup> 此後，汪精衛更進一步接受了孫中山在「知行合一」基礎上所提出的「知難行易」之說，並將其付諸實踐。刺殺攝政王一事，正是「知難行易」思想與虛無主義行動相結合的體現。<sup>14</sup> 汪精衛對此思想的重視，甚至延續至家庭教育。他曾與女兒汪文愷討論「知難行易」的理念，汪文愷在父親的薰陶下，也認為孫中山所創的「知難行易」之說，是救中國的思想途徑之一。<sup>15</sup> 父女間的思想交流記錄於1938年1月的日記中，正值抗戰初期的動盪不安時局中。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同日，汪精衛對英國路透社記者表示，如果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的生存，中方可以接受。<sup>16</sup> 10月22日，梅思平向汪報告他在香港與松本重治談判的結果。自10月25日起，汪與周佛海等人連日

<sup>12</sup> 汪精衛，〈汪季新先生自述〉，收入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年），頁252。此外，1941年4月，汪精衛寫下一首詩贈予夫人陳璧君，並在題跋中提到：「冰如手書陽明先生答聶文蔚書及余所作述懷詩合為長卷，係之以辭，因題其後。時為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讀《傳習錄》時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懷〉詩時已三十二年矣。」此語意指，早在1908年汪與陳相識相戀之初，便曾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顯示兩人不僅情感深厚，更在思想上有著深層的共鳴。這份跨越三十餘年的精神連結，猶如「書中自有顏如玉」，既是知識的交流，也是情感的寄託。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9年），頁84。

<sup>13</sup> 丘為君指出：「熟讀王陽明《傳習錄》的汪精衛，肯定理解《孟子》『惻隱之心』的概念就是王陽明『良知』說的源頭。他在〈革命之決心〉中曾言『嘗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讀其答聶文蔚書，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此處所提的〈答聶文蔚〉，正是《傳習錄》中一篇探討理想君子之良知、道德與行為準則的哲學文章，王陽明在文中強調「良知」作為道德判斷的根本，並以此作為君子行事的依據。汪精衛對此文的高度評價，顯示他不僅將陽明學視為個人修養的準則，更將其轉化為政治行動的道德基礎。」丘為君，〈邁向烈士之路：青年汪精衛的政治思想〉，《川亞研究》，第6卷第2期（2025年7月），頁133。

<sup>14</sup> 許紀霖評論汪精衛的暗殺活動謂：「知難行易，行就是知，行動就是一切，個人的道德實踐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於是，來自傳統的王陽明與來自俄國的虛無主義在晚清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迸發出強烈的唯意志論火花。」許紀霖，〈汪精衛：虛無時代的任性犧牲〉，《一個民族的精神史》（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頁58。

<sup>15</sup> 汪文愷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記。汪文愷，《我書如我師：汪文愷日記（1937-1938）汪精衛與女兒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新北：漢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2024年），頁14。

<sup>16</sup>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75。

密談，至30日，汪終於下定決心，指派高宗武與梅思平為代表，再赴上海與日方代表進一步接洽。<sup>17</sup> 這便促成了後來的「重光堂會談」及密約協議《日華協議記錄》。

在這段關鍵時期，汪於10月24日在重慶發表了一場題為〈知與行之聯繫〉的廣播演講。他在演講中提到「知難行易」的觀念，並進一步闡釋：「行之所以易，是因為有所信；信，是知與行之間的聯繫。」這裡的「信」指的是革命的信仰，即是三民主義與總理遺教。<sup>18</sup>

汪選擇這個題目，或許正反映出他在這段時間內面對是否與日本議和的重大抉擇時的內心掙扎與思想轉折。他試圖以「信」來連結「知」與「行」，為自己的行動尋找思想與信仰上的正當性。

汪政權成立後，他進一步闡述這一思想：「因為凡是知難行易的信徒，都應該明白行然後知的道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今三民主義，還沒有行，那裏說得上知呢？所以新國民運動綱要標中，既標出我們原有三民主義，便接着提出實行的方法。第一條說我們要實現民族主義，便要實行大亞洲主義。」<sup>19</sup> 然而，在1939年之前，汪尚未以大亞洲主義作為其思想的核心框架。他當時主要依據的是孫中山遺教中關於中日合作、中日提攜等論述，這些內容被汪視為革命信仰的一部分，也是他在1938年中「下定決心」與日本議和的思想支撐。事後，連周佛海也感慨地說：「決疑定計，實非易事」。<sup>20</sup>

<sup>17</sup> 邵銘煌，《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頁92。梅思平是周佛海的親信，與松本重治在香港的會談，被認為是重光堂會談的雛形，由於缺乏中文的資料，大多都是根據日文資料來探討。重光堂協議後汪精衛方面的行動計畫，可視為松本與梅在香港協商內容的具體化。董聰利，〈1938年における松本重治の対華和平工作参与——リベラルの模索と限界——〉，《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第40號（2020年9月），頁14-16。

<sup>18</sup> 林柏生，〈領袖言論講授大綱（初稿第二講第三、四節）〉，《中央導報》，第3卷第45期（1943年6月），頁45。

<sup>19</sup> 汪精衛，〈新國民運動綱要講授大意〉（1943年8月13日），收入中央電訊社出版委員會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選集》（南京：中央電訊社出版委員會，出版年不詳），頁399。

<sup>20</sup>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278。

汪精衛早在1908年撰寫〈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一文時，已明確指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並認為日本國內存在保全派與侵略派之分。他雖不否認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但認為其根源不僅來自日本的野心，更與中國自身的積弱不振密切相關。他認為，日本侵略朝鮮與滿洲，部分出於清俄條約所逼，是外來壓迫與中國積弱互動的結果。<sup>21</sup>

汪精衛早期的分析視角，使他能區分日本的擴張主義者與同情中國的和平派，並為日後的「中日提攜論」預留了思想空間。同盟會的另一位重要成員胡漢民，也曾在〈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中明確主張「中國與日本兩國國民的連合」，這在當時的革命黨人中屬普遍共識。這種合作理念的前提，是中國能夠自立自強，最終取得與日本對等的實力。因此，汪精衛始終堅持，中日若要實現真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中國自立的基礎上。這一思想從早期言論延續至他與日本合作建立南京政府的政治實踐，顯示其對中日關係的理解始終根植於中日兩國實力與地緣現實的判斷。

早期中日合作想像不僅體現在政治論述中，更實際反映於同盟會的行動層面。從《民報》的發行、革命資金的募集、秘密會議的召開，以至武器彈藥的籌措與運輸，多數均仰賴日本國內的廣泛網絡得以完成。<sup>22</sup> 許多日本的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如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人，與中國革命者往來密切，他們或出於泛亞細亞主義的理想，或出於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共同形塑出一種跨越國界的「東亞志士」政治共同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汪精衛的對日態度，不僅僅是策略性的親善，更是一種信念式的合作理想。他見證並參與了中日民間層面的合作，因此，他對中日關係懷有超越國家利益的理想期待。

<sup>21</sup> 汪精衛，〈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說〉，《汪精衛先生的文集》，第4卷（上海：中山書店，1929年），頁219。

<sup>22</sup>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所寫的《日本人與孫中山》，雖然原著出版於1954年，但仍是研究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經典之作。它從日本政治與思想的角度切入，分析孫中山與日本政客、民間志士的互動，並以豐富史料層層推演其革命網絡。他認為：「孫中山在日本與中國革命派的合作關係上佔關鍵地位。當他在日本時，雙方關係最親密。當孫離開，妒忌與懷疑取代友誼及信任。在孫的跟隨者中，只有汪精衛最像孫，有事傾向向日本求助。」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著，吳偉明譯，《日本人與孫中山》（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頁80。

此外，汪精衛在革命時期也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排日主義。他認為盲目排日無益於中國自強，反而可能將日本推向中國的對立面。他後來多次重申這一立場。例如，1937年5月在中央紀念週演講中，汪精衛便明確表示「我們對日態度是抗日不是排日」，此一主張最早可追溯至其革命時期的觀點。<sup>23</sup> 他主張應區分日本政府與人民、區分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其內部存在的和平派，並積極提倡中日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提攜合作。這種態度在當時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排外情緒普遍的氛圍下，顯得格外突出。

影響汪精衛的「中日提攜論」的要素，也不能忽略辛亥革命後汪留學歐洲時，剛好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體驗。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硝煙散盡，汪精衛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前往法國巴黎參與協調戰後利益分配的巴黎和會。然而，和會的結果卻讓中國代表團和整個中國知識界，如同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一樣，深感失望與憤慨。列強在山東問題上公然偏袒日本，無視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與訴求，使得長期以來對西方公理和國際聯盟的期待瞬間破滅。巴黎和會未能實現民族平等與正義的結局，促使汪精衛開始深刻反思現代國際秩序的根基及其未來發展方向。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汪精衛撰寫了〈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與〈人類共存主義〉（又名：巴黎和議後之世界與中國緒論）等重要文章，嘗試從更為宏大的全球觀點與人類文明演進的角度，重新思索中日關係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路徑。<sup>24</sup> 他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有兩大主要動力：「競爭」與「互助」。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極端競爭邏輯發展到極致的結果，而巴黎和會上國際聯盟的設立，儘管不盡如人意，卻也代表著人類對「共存」意識的初步覺醒。

---

<sup>23</sup> 汪精衛，〈我們對日態度是抗日不是排日〉，《中央訓練部公報》，第15、16期（1937年5月），頁275-276。

<sup>24</sup> 土屋光芳認為，汪精衛所感受到的教訓是：民主主義的勝利與軍國主義的敗北，應成為未來國際和平秩序的基礎。為了否定列強以武力政治正當化其行為，他主張應摒棄社會達爾文主義，改以「人類共存主義」作為新理念。汪嘗試將此普遍價值轉化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藉此壓制過去以漢族為中心的強勢民族主義。此外，汪在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中關係時，批判北洋政府與日本軍國主義勾結，並依據人類共存主義的理念，主張應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而從後者這點顯示，汪精衛並非如一般印象中那樣始終「親日」。土屋光芳，《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東京：人間の科學新社，2000年），頁261。

基於此，汪精衛明確主張，中日兩國作為「同文同種」之邦，理應在「互助」的原則下尋求深度合作，共同擺脫西方列強分化統治的命運，並抵禦日本內部軍國主義的支配。他在〈人類共存主義〉中明確指出：「吾人之抵抗日本，非抵抗日本，而是抵抗日本之軍國主義。」<sup>25</sup> 這一表述清楚地區分了「民族」與「制度」的差異，拒絕將民族衝突等同於永恆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他進一步強調：「軍國主義不去，人類共存主義不立。」<sup>26</sup> 可見，汪精衛所構思的中日提攜，並非僅出於短期的戰略考量，更是一種對國際秩序與亞洲文明重構的理想性思維。

在1920年撰寫的〈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一文中，汪精衛認為，中日兩國如兄弟般相鄰，理應自行解決彼此間的爭端，為何走向訴諸巴黎和會的裁決？他回顧日本過去為防範俄羅斯南下，曾將遼東與朝鮮視為防禦線；但在列強瓜分中國之後，日本的防線已遍布各地，安全形勢愈加複雜。他質疑，這樣的擴張是否真能保障日本的生存？併吞中國是中國的災難，卻未必對日本有利。

因此，汪認為，日本若真為自身生存計，應尋求除侵略之外的其他途徑。他援引日本國內和平派的觀點：「中國而能自強者，日本當與之提攜」，認為這才符合人類共存的原則。人類爭存固然因利害衝突而對立，但也因利害一致而能共存。他進一步指出：「雖然，國際無不可釋之仇讎，使日本幡然而改，對於中國誠意以希望和平，吾人猶將感之。」<sup>27</sup>

汪精衛所強調的「共存」與「互助」理念，成為其與日本接觸的核心語彙，成為大亞洲主義的思想基礎。<sup>28</sup> 巴黎和會的挫敗雖未改變國際格局，卻促使他對中日關係與國際秩序進行更具理想性的思考。

<sup>25</sup> 汪精衛，〈人類共存主義〉，《汪精衛先生的文集》，第4卷，頁14。

<sup>26</sup> 汪精衛，〈人類共存主義〉，《汪精衛先生的文集》，第4卷，頁14。

<sup>27</sup> 汪精衛，〈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汪精衛先生的文集》，第4卷，頁45。

<sup>28</sup> 值得注意的是，汪使用「共存」、「互助」等說法應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對此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參閱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99-101。

### 叁、理念的深化與實踐： 大亞洲主義與中日提携的戰時轉化

毫無疑問，孫中山是汪精衛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對汪而言，孫中山不僅是革命領袖，更是思想與行動的楷模。他曾自許為孫中山最忠誠的追隨者，將其理念視為政治信仰的核心。這種深厚的師徒情誼，不僅塑造了汪的革命生涯，也影響了他後來的政治選擇與外交立場，兩人的對日觀更有一定程度的相近性。

孫中山對日本的觀感在其政治生涯中呈現明顯的階段性變化，反映他對國際局勢、民族主義與亞洲地緣政治的思考。在革命運動初期，孫中山對日本抱持強烈的親近感。日本不僅提供庇護與支援，亦成為他推動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1905年於東京成立的同盟會，便是中日合作的象徵。當時部分日本知識分子與政界人士對中國革命表示同情與支持，使孫中山對日本懷有感激之情。這種情感促使他傾向亞洲主義，主張亞洲各民族聯合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孫中山強調中日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1915年出版的《中國存亡問題》中，他提出「無中國即無日本，無日本即無中國」的論述，強調中日兩國在亞洲振興中的互依關係。<sup>29</sup> 他認為，中日應攜手合作，推動亞洲民族的自立與解放，並共同抵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這一時期的孫中山，對日本仍抱持理想化的期待，視其為亞洲現代化的先驅與潛在盟友。

然而，自1919年起，孫中山對日本的觀感開始出現調整。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對日本在華行動的關注與批判日益升高，特別是針對其擴張政策所引發的民族情緒與外交爭議。在此背景下，孫中山逐漸轉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認為其政策已偏離先前所倡導的亞洲民族團結理念。1921年，孫中山與日本外交官重光葵會面時，曾明確表達對日本軍部勢力的不安與批評，尤其針對田中義一的擴張主張，顯示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警惕。<sup>30</sup>

<sup>29</sup>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49。

<sup>30</sup> 重光葵、渡辺行男，〈孫文を偲ぶ〉，《中國研究月報》，第487號（1988年9月），頁

進入1924年，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面貌。在當年1月至8月的三民主義演講中，他一方面高度評價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成就，認為其富強為亞洲各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典範與希望；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日本對中國與朝鮮的不守信義，指出其走上帝國主義道路，損害了亞洲民族的整體利益。這種評價既肯定日本成就，也警示其政策偏離亞洲主義初衷。

孫中山於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神戶發表了其生前最後一場極具歷史意義的公開演講，分為下午與晚間兩場。<sup>31</sup> 下午場以〈大亞洲主義〉為題，孫中山在演講中強調亞洲民族應聯合起來，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他以「王道」對比西方的「霸道」，呼籲日本應轉向協助亞洲民族自強，主動承擔領導亞洲解放的責任，而非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晚間場則以〈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為題，進一步呼籲日本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的民族解放與主權恢復，展現對中日合作的期待。

若將11月28日的演講置於孫中山在日本一系列演講的脈絡中觀察，其內容並不顯得特別突出。史峻（Craig A. Smith）指出，孫中山在日本的諸多演講中所展現的「亞洲主義」，不僅是理念的宣示，更是一種策略性的聯盟構想，旨在主張由日本領導亞洲各國，共同抵抗西方霸權。<sup>32</sup> 從此角度來看，11月28日的演講雖具象徵性與紀念性，但其思想並非孤立，而是延續其一貫的亞洲主義主張。

然而，該演講在抗日戰爭期間被賦予高度象徵意義，並與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的政治詮釋密切相關。隨著「大亞洲主義」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符號，其原初理念亦被重新包裝，並應用於不同的政治語境之中。自認為孫中山信徒的汪精衛，在延續孫中山思想的同時，將「大亞洲主義」轉化為其主張中日提攜的理論

---

48。

<sup>31</sup> 孫中山北上的經緯可以參考劉維開的論文，劉維開認為「大亞洲主義」演講，除了是孫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對於日本的懇切陳詞外，還應該將講演內容放在孫的聯俄政策與反帝國主義主張中思考。劉維開，〈孫中山北上與講演「大亞洲主義」的考察〉，收入楊同慧總編輯，《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下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年），頁87-111。

<sup>32</sup> 史峻（Craig A. Smith）著，韓絮光、林紋沛譯，《中國的亞洲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5年），頁239。

依據，使得這場演講在歷史記憶中承載複雜的政治意涵。<sup>33</sup>

自1939年起，汪精衛在與日本合作的政治立場確立後，愈加頻繁地引用孫中山神戶演講中的內容，特別是「中日應攜手協力、共謀兩國前途之發展」一語，作為其主張中日合作的正統性依據。他將該演講奉為總理遺訓，強調大亞洲主義應成為國民黨對日政策的核心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在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演講發表15年後，才積極倡言該理念。這段時間常被用來質疑他的政治動機，尤其因他此期間的中文著作未使用「大亞洲主義」一詞。然而，這類批評往往忽略了當時的歷史語境與溝通對象的選擇。在1930年代前期，汪精衛並非完全未提及大亞洲主義，而是選擇在面向日本人的語境中強調該演講的歷史象徵性。相較之下，「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演講」在日本社會與輿論中具有更高的辨識度與接受度，<sup>34</sup> 因此汪精衛援引此一歷史概念，反映了其對外溝通策略的調整與選擇。

1930年7月，汪精衛北上途中經日本赴天津參加國民黨擴大會議，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表示：「1924年冬，本黨總理孫先生北上，經神戶，曾有一度演講，此演講乃孫先生最後之演講也，其要旨在說明中日兩國之親切關係，期望貴國人

<sup>33</sup> 戰後學界普遍認為，汪精衛在抗戰期間倡導「大亞洲主義」並主張與日本合作，因而被視為對孫中山思想的歪曲與背叛。然而，若非有汪精衛的積極提倡，孫中山於1924年神戶演講所提出的「大亞洲主義」理念，或許將被塵封於歷史記憶之中。針對傳統批判，土屋光芳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種批判是否過於簡化？是否存在汪精衛的詮釋反而更接近孫中山思想某些層面的可能性？此問題揭示了思想史研究中「原意」與「後設詮釋」之間的張力。參閱土屋光芳，〈汪精衛の「和平運動」と「大亞洲主義」〉，《政經論叢》，第61卷第2期（1992年12月），頁124-125。

<sup>34</sup> 這種歷史遺緒發酵現象至今存在，2004年4月6日，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曾經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引用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演講〉中的「王道、霸道論」。稻盛把孫中山對日本人說的話原封不動地回贈給了中國的聽眾。對大家說：「中國是要行王道，還是要行霸道。這是在座各位領導決策的責任。」稻盛並說：「第二天，我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他說拿到了我的演講稿，對我說：『稻盛先生，我讀了演講稿。稻盛先生擔心的事情肯定不會發生，請不用擔心。』」參閱愛新翼、西村成雄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Ⅱ》（大阪：法律文化社，2024年），頁xiii；〈稻盛和夫：要讓中國人明白日本可信賴〉，收錄於「新浪財經」：<https://www.yicai.com/news/3301097.html>（2025/7/5點閱）。

士之了解，及勸敝國同志之努力，此孫先生之遺言，一般同志所切實遵守，且期於實現也。」<sup>35</sup>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國內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原本因寧粵分裂而持續的政爭被迫暫時中止，但國民黨內部在應對日本侵略的方針上仍存在顯著分歧。汪精衛與胡漢民在外交策略上意見不合，最終汪精衛脫離粵方，轉赴上海，並於同年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試圖重整政治力量。

在此背景下，汪精衛於12月6日接見「迎汪」運動的首都高校學生代表時，首次系統闡述其外交主張，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構想。此一方針，實為汪精衛對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與國內政治現實的折衷回應。

當時中國社會輿論普遍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主戰派聲音更為強烈。若再採取「不抵抗」政策，勢必加劇輿論對政府的批評；然而，若對日宣戰，則可能失去國際同情，且國際聯盟未能提供實質援助。面對此「和戰兩難」的困境，汪精衛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為中間路線，既避免全面戰爭，又維持外交談判的可能性。

此種策略本質上屬於消極且守勢的外交手段，與汪精衛一貫的政治立場相符。他強調在有限抵抗中爭取談判空間，反映出其對國際局勢的現實主義判斷。此後，汪精衛始終堅持此一態度，並在蔣汪合作的南京國民政府中（汪任行政院長後，又兼任外交部長）更為強化，成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基調。<sup>36</sup>

<sup>35</sup>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頁102。

<sup>36</sup> 參閱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頁105-108。此外，據土屋光芳指出，汪精衛所提出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本身存在結構性的侷限。作為一位典型的文人政治家，汪精衛缺乏實質的軍事資源與抵抗手段，使得其政策在實踐層面上往往傾向於「交涉」而非真正的「抵抗」，實質上演變為一種綏靖取向的外交策略。這種角色的承擔，反映出汪精衛的政治處世哲學，其背後的思維模式與中國歷史上文人政治家的行事風格具有高度相似性——重視道義、訴諸理性、傾向妥協，而非訴諸武力或強硬手段。參閱土屋光芳，《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權》（東京：人間の科学新社，2004年）。土屋在該書的第六、七、八章，總計3章的篇幅討論1930年代汪精衛所提出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土屋的研究介紹可參閱王晟旭，〈近年日本有關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現狀評述（2000-2022）〉，《漢學研究通訊》，第43卷第2期（2024年5月），頁12。

1933年10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刊登特派員長岡克曉對汪精衛的專訪，標題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揭示了對日態度的全貌：解決滿洲問題需要耐心——與關鍵人物汪兆銘會面」。報導中以同情筆調描繪汪在中國政局中的處境，並指出：

對日本人而言，是非黑白分明：要不是白，就是黑。但對心理複雜多變的漢民族來說，白也可以是黑，黑也可以是白，這並不奇怪，且實際上也確實存在。白與黑之間還有許多灰色地帶。對滿洲問題的絕對不妥協態度與對排日行為的緩和，對日本人來說是矛盾的，但對中國人而言卻毫無矛盾。

一句話可以清楚說明這種態度，那就是首相兼外相汪兆銘提出的口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氏的政治立場極為困難，他曾多次與蔣介石在政治、軍事與理論上對抗，曾是最忠實於國民黨三民主義精神的人，如今卻身處與三民主義漸行漸遠的國民政府中。雖然名義上是首相兼外相，但在制度上卻無法對政治發言，實際上受制於蔣介石。而宋子文則與蔣氏如同一體，從財政上壓制汪氏。在兵力與財力為主導的中國，汪氏的政治地位可謂極其艱難。<sup>37</sup>

在專訪中，汪精衛重申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表達他的中日提攜理念。長岡記錄如下：

我們就日中關係的突破熱烈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但遺憾的是，他幾乎沒有透露任何具體的外交突破方案或中國的方針。他深知日本對滿洲國的承認與扶植是既定政策，也知道中國人民對此問題的強烈反對，因此作為首相兼外相的他，根本無法就此問題具體發言。他僅以抽象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日中觀點：

<sup>37</sup>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は対日態度の全貌を語る：滿洲問題解決は忍耐が必要 問題の人汪兆銘氏と会見〉，《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933年10月1日。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總理從廣東前往北平途中，因船務停靠神戶，曾就日中關係發表演說，指出兩國並非命中注定的敵人，而是可以也必須協調合作。回顧現實中的滿洲問題，孫總理的理想似乎難以實現，雙方意見完全對立，處於對抗狀態。然而，世界並非只有日中兩國，情勢也在不斷變化。只要雙方都能保持足夠的耐心與謹慎，即使是看似癌症般的滿洲問題，也可能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點。從長遠來看，孫總理的見解仍是正確的。即使是蔣介石、黃郛等政治家與官員，在具體細節上或許有異議，但對孫總理的基本理念並無反對。即使將來我不再擔任外交責任者，換了他人，這一大方向也不會改變。」<sup>38</sup>

從上述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汪精衛在此階段尚未概括使用大亞洲主義一詞，而是聚焦於大亞洲主義演講本身的歷史意義與象徵價值。這一策略顯示他刻意強調孫中山思想的延續，以爭取日本理解與支持。

當時「大亞洲主義」尚未固定為政治符號，汪精衛更常使用「中日合作」、「中日共存」等語彙，這些概念也是孫中山「亞洲主義」思想的核心。例如在1933年6月5日，汪精衛在中央紀念週演講〈充實國力為救亡之根本辦法〉，便提到：「況且日本輿論中明明白白也有一部分是知道著眼於中日共存，而不以侵略為然的。欲使這一部分的輿論，能在日本見之實行，一方固然要日本人之努力，一方也要中國人之努力，如果以兩國人之努力，使中日共存之主張得以實行。」<sup>39</sup>

1935年2月20日，汪精衛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發表了一場重要演說，當時外界媒體稱之為〈對日關係書〉，後來正名為〈關於中日外交方針報告〉。此一演說的背景，是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於同年1月22日在議會中提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聲明，意圖修復中日關係，並改善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此舉在中國引發廣泛關注，國民政府亦對廣田的倡議表示回應，

<sup>38</sup> 〈『一面抵抗・一面交渉』は対日態度の全貌を語る：滿洲問題解決は忍耐が必要 問題の人汪兆銘氏と会見〉，《大阪毎日新聞》，1933年10月1日。

<sup>39</sup> 〈汪院長報告中日問題，為世界問題之一部，國聯簽約各國應共同謀解決，充實國力為救亡之根本辦法〉，《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6月6日，版2。

汪精衛則主張在「不喪權之原則下，謀中日之親善」。<sup>40</sup>此方略也同樣得到蔣介石、黃郛的支持。<sup>41</sup>

為配合此一政策方向，汪精衛於2月22日以行政院長名義頒布命令，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展現推動中日和解的具體行動。然而此舉在黨內引發不少質疑與反對聲浪，為爭取黨內支持，他在演說中引用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事例，強調：「還記得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孫先生在神戶演說，有幾句話道：『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這篇演說是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說，凡我同志，刻骨不忘，而且總理一生對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也不離乎此。」<sup>42</sup>

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所引用的孫中山言論，實際上出自1924年11月28日晚間在神戶發表的〈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演講，而非當日下午的〈大亞洲主義〉演說。<sup>43</sup>汪特別強調這場演講為「孫中山一生最後演說」，藉此賦予其中日親善主張以歷史位階與不可違逆性，強化其道德權威。

---

<sup>40</sup>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頁315。為了探詢日本政府的真意，蔣汪決定藉駐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回任所之便，請其以個人身分順道詢問日本，王於2月19日抵達東京，曾兩度會見廣田。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臺北：國史館，1995年），頁436。

<sup>41</sup> 島田俊彥指出：「中國方面的這種態度，究竟是真誠的，還是僅僅是一種偽裝，雖然無法確定，但無論如何，蔣介石與汪精衛所主張的『親善』，確實比廣田弘毅的『和協』更具實質內容，不只是紙上談兵。」宇野重昭，〈広田弘毅の対華政策と蔣介石——自護体外交の限界性〉，《國際政治》，第56期（1977年3月），頁38。黃郛曾在1935年2月28日致電蔣介石，催促蔣要依原訂計畫，先由汪發表，再由蔣附和。並提供草稿略稱：「讀某日兄在中政會報告，對日關係書，為我國復興計，為東亞和平計，並為貢獻世界和平計，均應如此。」「黃郛電蔣中正日本望鈞座盡早發表擁護汪兆銘主張中日提攜並代擬函電」（1925年2月28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11-094。

<sup>42</sup> 汪精衛，〈關於中日外交方針之報告〉，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中冊，頁352。

<sup>43</sup> 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年），頁276。

汪的詮釋策略，反映出他在推動「中日提攜論」時，試圖以孫中山思想作為延伸與依據，藉由意識形態忠誠（Ideological Loyalty）來化解黨內與社會對其親日立場的疑慮。他援引孫中山理念，並置於「革命正統」的脈絡中，使外交主張看似延續總理遺志，而非背離民族利益。

儘管如此，汪精衛的親日立場仍在黨內外引發強烈反彈與質疑。<sup>44</sup> 1935年11月1日，他在南京出席國民黨六中全會期間遭遇刺殺，身中數槍，重傷倒地，最終黯然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這起事件對汪造成的身體與心理創傷，是否影響他日後離開重慶、轉而從事和平運動的決定，雖難以斷言，但構成其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轉折。

不久之後，12月25日，汪的親信、前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進一步加深其個人與政治上的打擊。汪精衛親自撰寫墓表悼念唐氏，文中寫道：「此數年間國難日深，君盡瘁所職，其於外交，尤日夜勞思，以求所以救亡圖存者。平日對於世界大勢、中日關係，篤信總理之遺教而死守之。對於黨部及政府之決議，悉力以赴，勞苦無所避，疑謗無所顧。」<sup>45</sup> 雖是為唐有壬而作，但其中強調「死守總理遺教」與「疑謗無所顧」，亦可視為汪自己對身處飽受批評的政治處境所做的辯護。

自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旋即進入全面大規模戰爭狀態。面對民族存亡的嚴峻考驗，中國內部政治力量趨於整合。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經多月反覆磋商，形式上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然而，在此背景下，蔣介石亦同時推動國共兩黨合併計畫，此番再度「容共」的動向令汪精衛深感疑慮。<sup>46</sup>

<sup>44</sup> 例如王養沖便彙整了胡漢民對汪蔣合作下外交政策的批判言論，於1935年4月出版《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一書。在弁言中，他直言：「南京的降日主張者，為了實行降日，又拚命曲解總理的大亞洲主義，以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為降日的護符。」胡漢民著，王養沖主編，《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廣州：中興學會，1935年），頁3。

<sup>45</sup> 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120。

<sup>46</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165。關於蔣介石與周恩來商議國共兩黨合併之事，可參閱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及其日記解讀》，第2卷（香港：三聯書店，2022年），頁195-216。

1938年下半年，中國軍事抵抗屢遭挫敗，武漢與廣州相繼淪陷，長沙大火更重創民心士氣，使國民政府內部對戰局的判斷日益悲觀，和平談判的聲音逐漸高漲。然而，由於日本堅持以蔣介石下野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汪精衛、孔祥熙等人「亦不敢公然作議和之主張」，和平之路陷入僵局。<sup>47</sup>

在此背景下，汪精衛已透過高宗武與日方建立秘密聯繫。1938年11月20日，日方與汪派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簽署《日華協議記錄》，約定汪在離開重慶後，日方首相近衛文麿將立即發表和平聲明，汪則以公開電報予以呼應。<sup>48</sup> 12月18日，汪精衛決意搭機離開重慶前往昆明，翌日轉飛至河內。<sup>49</sup> 日方則配合其出走行動，於12月22日發布第三次近衛聲明，正式揭示日汪合作的政治意圖。

<sup>47</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王世杰日記》，頁154。事實上國民政府內部皆知汪主張和議，汪勸說蔣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據汪離開重慶後給彭學沛的電報中說道：「謂其離國之動機係因中央不願考慮和議，及本黨有進一步容共之趨向。」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王世杰日記》，頁167。去國動機的關鍵點來自12月9日的一場由蔣介石在黃山官邸召集重要人員的會議中，汪堅持對日主和，但蔣反對，針鋒相對，汪自謂「復激切言之，卒不納」。汪精衛，〈曾仲鳴先生行狀〉，收入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頁618。蔣的態度讓汪大失所望，陶希聖在給胡適的信中，也提及蔣在12月8日到重慶後，態度完全改變，全部的計劃在提攜共產黨，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地拒絕。「這樣的變動，以及客觀的困難，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都成了罪狀。……我們才下決心去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97-398。汪在出走後，12月28日的勸蔣以近衛第三次聲明為談判基礎的信中，開頭也是提及12月9日在黃山官邸的談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51-52。

<sup>48</sup> 日方通知汪精衛，將以第三次近衛聲明的形式公布《日華協議記錄》的內容。儘管汪精衛大致接受了該協議，但在回覆日方時仍提出具體要求，強調日方應在聲明中明確承諾：不對中國經濟進行壟斷，亦不干涉中國內政。岩谷將，〈日本陸軍眼中的汪精衛和平運動〉，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149。

<sup>49</sup> 據李志毓的說法是「重光堂會談」明確而具體地制定出了所謂「防共駐兵地區」和撤兵條款，而汪正是由於這些條款，才最終下定決心脫離重慶。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202。

汪精衛的出走，象徵著他從原本體制內主張和平的立場，轉向採取體制外的行動以促成中日和談。<sup>50</sup> 12月29日，他發表了著名的「艷電」，公開呼籲對日和平，並由此推動與日本建立合作的政策。此舉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引發極大爭議與批判，基於「民族大義」，汪的決策與行動自此被貼上「附逆」與「漢奸」的歷史標籤。<sup>51</sup> 汪所做的選擇，無疑是非常艱難且充滿爭議的，他背後的心理掙扎與政治考量引人深思。

汪精衛在河內期間的心境，可從他1939年2月寫給長子汪文嬰的信中窺見一斑。他提到：「我秘密建議已不下二十餘次，至12月29日始公開建議，受所謂『永遠開除黨籍』之處分……我此次主張乃經媽媽及諸人累月之商量，而我數月以來橫一『殉國歟救國歟』之問題於胸中，沉吟不下萬餘次。」<sup>52</sup> 這段話深刻反映出他在政治抉擇上的痛苦與掙扎。

汪認為，「殉國」雖易為，但僅止於個人忠誠與情感的完成；而「救國」則需承擔千災萬毒，困難重重，卻是他最終不得不選擇的道路，因為「國不可亡，亡則不易復存也」。這種抉擇體現他信奉的「知難行易」精神，即使明知艱難，仍必須實踐。

這封信透露汪精衛在決定與日本合作前的心理歷程，並展現他如何結合哲學信念與政治行動，將「救國」視為超越個人安危的歷史責任。這種自我定位既延

<sup>50</sup> 1939年1月4日，汪精衛在致孔祥熙的信中坦言，主和之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一語道破當時體制內主和派的普遍心態。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1冊（香港：春秋雜誌社，1959年），頁20。對於抗戰陣營中體制內的主和者而言，汪精衛的出走與公開主張和平，無疑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政治選擇。王奇生曾以民國時期名人日記群為研究素材，深入分析這一群體的心理狀態，進一步凸顯汪之舉的艱難與特殊。王奇生，〈抗戰初期的「和」聲〉，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7-71。

<sup>51</sup> 隨著臺灣社會日益多元，對汪精衛的歷史評價也逐漸出現變化。例如，根據2013年一項針對598位高中生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僅有26%的受訪學生認為汪精衛是漢奸，30%則認為他不是，另有27%表示不知道，16%表示沒有意見，1%未作答。這項研究指出，認為汪精衛「不是漢奸」的學生，已經跳脫傳統「民族大義」的單一視角，開始以多元的觀點重新反思與理解汪的歷史選擇。管美蓉，〈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臺灣文獻》，第66卷第3期（2015年10月），頁214-215。

<sup>52</sup> 〈曾仲鳴致方君璧函〉（1932年2月8日），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410。

續陽明學與革命思想，也構成推動「中日提攜論」的思想基礎。

汪精衛積極推動「中日提攜論」，以「大亞洲主義」作為核心理念，同時隱含與蔣介石爭奪話語權的意圖。1939年7月7日，蔣介石發表〈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告日本民眾書〉，向日本國民闡述中國抗戰的立場與理念。他在同年6月20日的日記中記錄道：「決定告倭民書之主旨曰：『告日本國民書，以總理亞細亞主義，與余口述囑陳布雷筆錄，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之敵乎友乎一文之意為中心。』」<sup>53</sup> 這是蔣在其日記中唯三次提及「大亞洲主義」的第二次。<sup>54</sup>

蔣之所以重新援引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乃是為了批判日本政府新設的「興亞院」。他在文告中直言：「你們政府所謂的『興亞院』，其真正意義原是『亡華院』，而其結果恐怕將變成『亡日院』。」<sup>55</sup> 蔣進一步勸誡日本民眾：「希望你們儘速恢復東方道德，並認識三民主義的真正價值。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東方道德，其中的仁愛、信義與和平，正是我們國際政策的根本。奉勸你們也應當如此改正，至少從今以後不要再說欺騙的話。凡使用一個詞語，都應依其本義解釋，不可欺人。」<sup>56</sup> 蔣的言論延續了孫中山當年勸戒日本改行「王道」的精神，以道德與和平為基礎，呼籲日本回歸東方傳統價值，摒棄侵略與欺瞞。

有鑒於此，汪精衛於7月9日迅速發表其重要演說〈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系統闡述其對中日合作的理論基礎與政治意圖。<sup>57</sup> 他引用孫中

<sup>53</sup> 張世瑛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補編（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860。

<sup>54</sup> 愛新翼、西村成雄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II》，頁168-169。

<sup>55</sup> 蔣中正，〈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告日本民眾書〉，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1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100。

<sup>56</sup> 蔣中正，〈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告日本民眾書〉，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1卷，頁100。

<sup>57</sup> 近衛自述對汪此篇文章感到滿意，在報紙上評論到：「汪先生於今年七月十日發表了題為《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的歷史宣言，與蔣介石決裂，並與共志者聯合，以日中提攜為目標，開啟前進之路。此聲明率直接受近衛聲明三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甚至高喊『沒有日本就沒有東亞』。」近衛文磨，〈汪兆銘氏と私（上・下）〉，《大阪每日新聞》，1939年10月10日、11日。

山的話：「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並主張中日若在外交與軍事方針上達成一致，才能實現「平等互惠」經濟合作。<sup>58</sup> 汪強調，他所構想的合作並不損害中國主權，反而是基於雙方「利害一致」的現實邏輯，是中國在亂世中求生存、謀發展的必然選擇。

汪指出，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制定《建國大綱》，當時的中日關係是依照和平合作的方針推進。1925年間，孫中山逝世，汪自稱繼承其遺志，主持國民政府，並延續其對日政策。然而到了1928年間，濟南事件爆發，成為中日關係惡化的起點，最終導致九一八事變。<sup>59</sup> 汪認為，這是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偏離了孫中山的原則，未能妥善處理外交與軍事危機。他主張應回歸孫中山時期的和平合作方針，並以此作為推動「中日提攜論」與「和平運動」的正當性。

緊接著在1939年7月22日，汪精衛發表了〈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一文，然而此文的日文標題卻被改為〈大亞細亞主義救國論〉，意味著內外針對性的不同與宣傳意味。<sup>60</sup> 在此文中，汪針對「日本是否有誠意和平」的質疑，提出解答之道，便是重讀孫中山於1924年在神戶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演講。

他指出，這是孫中山最後一次公開演說，也是政治理想的集中體現。汪認為，從大亞洲主義中可以看出亞洲所面臨的重大危機，以及亞洲人所肩負的歷史責任。他主張，中日兩國只能成為朋友，不能成為仇敵，因為唯有合作，才能共同應對危機；若彼此為敵，則將互相消耗，最終為外人所乘，導致同歸於盡。他強調，唯有理解大亞洲主義精神，才能認識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並消除對日本誠意的懷疑。<sup>61</sup>

---

<sup>58</sup> 汪精衛，〈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下冊，頁455。這篇文章先是在7月9日晚間廣播，7月10日發表於《中華日報》。

<sup>59</sup> 汪精衛，〈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下冊，頁455。

<sup>60</sup> 汪精衛，〈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收入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0年），頁56。

<sup>61</sup> 汪精衛，〈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下冊，頁463。

因此，〈大亞細亞主義救國論〉的日文題名，不僅更貼近文章主旨，也更明確地傳達出汪精衛試圖以孫中山思想為依據，為其「中日提攜」與「和平運動」尋求正當性的政治意圖。

同年8月，由汪精衛主導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並發布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份宣言正式將汪精衛的「中日提攜論」納入中國國民黨（汪派）的基本政策。宣言中強調：「中日兩國當為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並再次將孫中山在神戶發表的大亞洲主義演說奉為「總理遺教」，聲稱所有黨員必須服膺實踐。<sup>62</sup> 此舉旨在以孫中山遺志為依據，重塑汪政權的合法性。

汪精衛在其政治理念的建構上，進一步嘗試將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加以融合。他所發表的〈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1939年7月22日）、〈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1939年11月23日）、〈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1940年11月12日）等文中的論述顯示，汪精衛將大亞洲主義視為實現東亞和平秩序的思想基礎，並認為其本質與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相一致。這種詮釋不僅試圖將汪政權的內政原則與外交構想進行整合，也賦予其與日本合作的行動一層強烈的思想正當性。<sup>63</sup>

---

<sup>62</sup>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1925年5月24日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表明將完全繼承並奉行孫中山的遺教與未竟之志。文末有「吾黨全體一致奉行總理之遺教」，隨著國民黨對孫中山思想的整理和宣傳，「奉行總理遺教」逐漸成為黨內團結的口號和行動綱領。這不僅包括《三民主義》等著作，也涵蓋了孫中山的革命實踐經驗、政治理念和對未來中國的設想。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頁183-187。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重慶召開，通過林森領銜提議，此後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重慶方面此一動議提出的背景中，包含著針對當時汪精衛等人打著「實現國父遺志」旗號另立南京政權、混淆視聽的特殊形勢。此外，關於汪精衛政權強調「國父」崇拜的實施情況，參閱李文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86期（2004年12月），頁101-111。

<sup>63</sup> 以往研究多傾向認為，汪精衛對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的詮釋是一種扭曲的操作。例如伊東昭雄早期的批判指出，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實際上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的延伸，屬於策略層面的倡言。該演講後來被汪精衛政權援引，作為其政權正當化的理論依據。然而，此時的大亞細亞主義已失去原有的思想內涵，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在汪精衛既有思想基礎上，汪政權積極透過教育、宣傳與外交等多個層面推動「中日提攜論」與「大亞洲主義」的普及與制度化。透過報刊、演講、教科書與視覺宣傳品，汪政權建構出一套具有鮮明特色的政治話語體系，其中「大亞洲主義」、「兄弟之邦」、「和平建國」等詞彙成為頻繁使用的語言符號，旨在塑造民眾對中日合作的正面認知，引導輿論朝向和平與穩定的方向。

這些話語既出現在文字，也融入圖像設計，如海報、標語與儀式場景，以強化政治理念的滲透力。<sup>64</sup> 汪精衛本人亦透過不斷的演說與文章發表，反覆強調「非戰非降」的立場，試圖建構一種有別於蔣介石「全面抗戰」的政治形象，以爭取因戰爭疲乏而產生厭戰情緒的民眾支持。

這種話語策略既動員內部政治，也承擔外交宣示，反映汪政權在思想與實踐上的雙重企圖。最終，「大亞洲主義」不僅成為汪政權的核心理念，也逐步轉化為其政治象徵，透過制度化宣傳與外交話語，營造歷史正當性與追隨區域主導權的形象。

然而，從本質上看，汪政權依附日本、以「和平救國」之名倡導「大亞洲主義」，實則是一種外援合法性（external legitimation）與意識形態合法性（ideological legitimation）的結合，目的在於對抗重慶政府的「正統性」與「正當合法性」，並重塑自身地位。<sup>65</sup>

---

伊東昭雄，〈「大アジア主義」と「三民主義」——汪精衛傀儡政權下の諸問題について——〉，《橫濱市立大學論叢》，第40卷第1號（1989年3月），頁225-247。

<sup>64</sup> 關於汪政權在淪陷區進行的宣傳，到底取得多少民意支持的成效？一直是個難解的問題。「爭取民心」一直都是汪政權最迫切的任務，在行政院下還特設宣傳部。儘管汪精衛與日本之間存在持續的緊張關係，但南京政權在宣傳、文化和政治儀式方面被允許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除了文字的政治宣傳外，最近戴杰銘（Jeremy E. Taylor）所著《佔領的圖像：汪精衛政權的視覺文化（1939-1945）》一書，提供不同傳統方向的新視野，書中分析淪陷區產生的印刷文化、平面藝術、攝影、電影、繪畫、公共藝術和圖片小冊子，以及南京政權政治文化的表演性等方面。參閱Jeremy E. Taylor, *Iconographies of Occupation: Visual Cultures in Wang Jingwei's China, 1939-194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21)。

<sup>65</sup> 關於「正統性」的爭奪，汪不僅要與重慶爭，也先要與日本爭。可參閱蕭李居，〈變調的國民政府：汪、日對新政權正統性的折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125-168。

## 肆、理念與現實的衝突： 中日提攜論與東亞新秩序的糾葛

近衛文麿與汪精衛，兩位歷史轉折期的關鍵政治人物，皆曾參與「巴黎和會」。此經歷使他們接觸反帝國主義與種族平等思想，並留下相關紀錄。<sup>66</sup> 值得注意的是，近衛文麿之父近衛篤麿乃日本早期亞洲主義之重要倡導者，其核心主張為基於「同文同種」理念所建構之中日合作。<sup>67</sup> 近衛文麿早期秉持「反英美協調外交」立場，對亞洲團結懷抱理想，與孫中山早期亞洲主義理念相通。<sup>68</sup> 然而，雖孫中山的亞洲主義可視為兩者的思想媒介，近衛與汪在1930年代初期並無實質互動。在此階段，近衛文麿對於中日合作的主要考慮對象似乎側重於蔣介石。<sup>69</sup>

<sup>66</sup> 近衛文麿在1920年撰寫的《戰後歐美見聞錄》，展現他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批判與對日本未來發展的憂慮。他認為，國際聯盟雖名義上促進和平，實則由英美主導，維護既有霸權，對日本等新興國家不公平。此一懷疑「國際協調」的立場，為他日後推動「東亞新秩序」奠定思想基礎。參閱近衛文麿，《最後の御前會議／戰後歐米見聞錄——近衛文麿手記集成》（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頁338-351。

<sup>67</sup> 近衛自己曾這樣回憶他的父親篤麿：「父親的思想並不完全是侵略主義。他的想法是，面對歐洲勢力逐漸侵入東洋，日本應該引導中國，與之合作，共同保全中國的領土。這是一種例如『大亞洲主義』那樣的思想。」近衛文麿，〈父のこと〉，收入千倉豊編，《近衛文麿清談錄》（東京：千倉書房，1936年），頁36。

<sup>68</sup> 藤井昇三認為孫中山的亞洲主義由兩個要素構成：黃白人種鬥爭觀與中日提攜論。然而，這樣的亞洲主義在1919年以後基本上不再成立，黃白人種鬥爭觀被根本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壓迫民族 vs 被壓迫民族」的對立與鬥爭觀。中日提攜論也在1919年日本帝國主義遭到公開批判後瓦解。藤井認為在1924年11月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孫中山完全未提及黃白人種鬥爭觀與中日提攜論，顯示他早期的亞洲主義在邏輯上與事實上都已經崩潰。然而《大亞洲主義》演講中雖未使用「中日提攜」這一術語，但其內容明確表達了中日合作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同推動亞洲復興的理念。藤井昇三，〈孫文與近代日本〉，《政大日本研究》，第3號（2006年1月），頁50。

<sup>69</sup> 據近衛自述，在1932年間，他曾經與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會談，蔣作賓警告說如此以往中日之間的衝突有可能發展成世界大戰，中日關係必須把蔣介石的勢力放在首位來考慮。「如果成為世界戰爭，結果英美獲利，日本中國可能同歸於盡。所以，日本不正應該從現在開始，從大局著眼改變政策，和蔣介石攜手，來處理大亞洲的問題嗎？這也是孫文提出的理想。」對此，近衛表示自己是從心底表示贊同的。近衛文麿著，高天原、孫識齊譯，《日本政界二十年——「近衛手記」》（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8年），頁10；蔣作

1937年6月初，近衛文麿出任首相時，汪精衛曾指示林柏生發表簡短時評以示好感。<sup>70</sup> 當時，日本輿論與政界寄望近衛調和政黨、軍部與官僚矛盾，開創「新政治」。西方觀察者一度期待他緩和中日戰爭，甚至以談判解決。

如前所述，汪主張聯合日本國內和平派以遏止軍部擴張，近衛因此被視為關鍵人物，寄望其約束軍部。高宗武回憶：「近衛是日本公爵，自認屬於『自由派』的『君子』，與天皇關係密切，身邊多為自由派與青年貴族。他同情中國似乎不假，但我們當時並不知他與日本最有權力、最具野心的軍事將領也關係密切。」<sup>71</sup> 高宗武所稱的「我們」即包括汪精衛，而這種誤判，或許正是悲劇的開端。

事實上，軍部的制度優勢與近衛的優柔性格，使他在對華戰爭問題上採取「迎合」軍部的態度。近衛雖傾向和談，但為維持內閣穩定，仍選擇接受軍部主張，並在第一次近衛聲明中公開宣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此舉直接切斷與蔣介石和談的可能，實質上迎合軍部要求，近衛事後感到後悔。<sup>72</sup>

1938年11月3日，第二次近衛聲明發布，標誌日本對華政策的重要調整。該聲明修正第一次聲明中「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並重新界定中日戰爭性質，聲稱：「日本所冀求者，在建設一可以確保東亞永久安定的新秩序，此次征戰的究極目的，亦在於此。」<sup>73</sup> 此表述暗示，即便國民政府願參與東亞新秩序建

---

賓在其日記也有記述，1932年8、9月間在鎌倉與近衛有數次的晤面，談及中日經濟提攜、日本承認滿洲國等問題。在8月8日的會面中，近衛承認軍閥內閣始終欲利用中國之分裂，故不惜多方以搗亂，彼願盡力以斡旋此危局。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市檔案館編，《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461。

<sup>70</sup> 「汪兆銘電某對日本近衛公組閣可發表簡短時評表示好感與希望等並詢方等已癒否」（1937年6月2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18-010100-0005-052。

<sup>71</sup> 高宗武著，陶恆生譯，《高宗武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頁28。

<sup>72</sup> 伊原沢周，〈汪精衛と近衛首相：ハノイの滞在とその苦悩〉，《東洋文化學科年報》，第5卷（1990年10月），頁19。

<sup>73</sup> 沈紱，《和平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出版時地不詳），頁4。沈紱曾任汪精衛政權的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此書為當時汪政權舉辦僑務講習班的訓練教材。據近衛自述，近衛聲明提出三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並強調日本不求領土、不求賠償，尊重

構，日方亦不拒絕。此外，聲明及當日廣播指出，此任務將由日、滿、中三國在「道義基礎的自主連繫」上建設新組織。<sup>74</sup>

過去日本官方刻意迴避亞洲主義連帶表述，此次聲明卻首次將亞洲主義制度化為政策。<sup>75</sup>有鑑於此，有研究認為：明治以來日本之亞洲主義，常以「反歐美」作為消解中日矛盾之策略；然而，「東亞新秩序」中所呈現之亞洲主義，則以「道義」一詞為象徵，試圖援引東亞傳統固有價值觀，確立中日之間平等連帶之秩序原則。1930年代的亞洲主義已不再依賴白人與黃種人之間人種對立之框架所建構的「反歐美」連帶，而是轉向孫中山曾提出的、以「王道」取代「霸道」的亞洲固有哲學。遂被認為，此乃對亞洲主義之新定式化要求與實踐。<sup>76</sup>而在此進程中，作為近衛智囊團的「昭和研究會」發揮了關鍵作用。<sup>77</sup>

「東亞新秩序」之推動核心在於中日提攜。然而，考量到中日兩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如何實現中日提攜便成為關鍵問題，其解決之道繫於日本軍部的態度。日本陸軍內部對於中日戰爭之善後方針，自1938年中旬始歷時約半年進行調整。7月，陸軍參謀本部之《日支關係調整方針案》即已提及中日以「重建東洋文化」為共同目標，期望透過互助共榮，建立相互善鄰之關係。此「重建東洋文化」之方針，最終於11月18日之決定中修正為「建設東亞新秩序」，並成為陸軍之基本目標。此一修正與昭和研究會所提出之「東亞新秩序」構想幾乎完全一致，顯示

---

中國主權，甚至願意考慮撤廢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他認為這是史無前例的道義性和平條件，因此稱此次戰爭為「聖戰」。近衛文麿，〈汪兆銘氏と私（上・下）〉，《大阪每日新聞》，1939年10月10日、11日。

<sup>74</sup> 沈紱，《和平運動的理論與實際》，頁8。

<sup>75</sup> 庄司潤一郎，〈近衛文麿に見るアジア主義の変化——中国認識を中心として〉，收入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4年），頁176；並參閱三谷太一郎，《日本の近代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岩波書店，2017年），頁190-198。

<sup>76</sup> 庄司潤一郎，〈近衛文麿に見るアジア主義の変化——中国認識を中心として〉，收入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頁177；並參閱三輪公忠，〈「東亞新秩序」宣言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の断層〉，收入氏著，《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一九三〇年代論として》（東京：創世記，1981年），頁196-231。

<sup>77</sup> 庄司潤一郎，〈日中戦争の勃発と近衛文麿「国際正義」論——東亞新秩序への道程——〉，《國際政治》，第91號（1989年5月），頁39-54。

中日提攜之基本理念已獲得陸軍之認可。<sup>78</sup>

11月30日的御前會議上，日本政府決定培養「更生中國」，使其成為構建東亞新秩序之核心成員，並納入日、滿、中三方體系。然而，日本政府當時尚未將汪精衛列入「更生中國」新政權之人選。推動「汪工作」的目的在於促使重慶政權瓦解，而非讓汪精衛統一中國並以此達成和平。<sup>79</sup>

第二次近衛聲明之發表，據研究顯示與當時並行之高宗武工作及汪精衛之動向並無直接關聯。<sup>80</sup> 蔣介石方面對此聲明仍堅決拒絕，認為日本「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著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sup>81</sup> 反觀汪精衛，卻認為此聲明可作為和談之原則。汪於1938年12月，帶走親信脫離重慶國民政府。他接受了日方已提出之各項條件：為「防共」而進行合作、承認滿洲國，作為交換，日本將撤銷治外法權、歸還租界，並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推進經濟合作。為支持汪精衛之決斷，近衛內閣在汪出走後旋即於12月22日發表第三次聲明，即當時通稱之「近衛聲明」，提出了與「更生中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方針。<sup>82</sup> 聲明中宣稱，日本不要求領土或賠償，將尊重中國之主權，並為促進中國之獨立完成，考慮撤銷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在此一系列舉措中，「東亞新秩序」似乎首次以具

<sup>78</sup> 井上壽一，《增補 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16年），頁203。

<sup>79</sup> 〈重慶政權に対する内部切崩しおよび自壊促進のための現地宣伝工作方針について〉（昭和14年1月4日），收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2冊（東京：六一書房，2011年），頁698。

<sup>80</sup> 庄司潤一郎，〈近衛文麿に見るアジア主義の変化——中国認識を中心として〉，收入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頁174；並參閱戶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東京：論創社，1991年），頁306-310。

<sup>81</sup> 蔣介石，〈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1938年12月26日），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5卷，頁572。

<sup>82</sup> 「第一次近衛聲明」、「第二次近衛聲明」等用語，並非當時日本政府的正式名稱，而是戰後史學界與媒體在整理昭和時期外交政策時所採用的分類方式，旨在便於後人理解與研究近衛文麿擔任首相期間對中國政策的幾次重要發言與政策轉變。當時，日本將第一次近衛聲明稱為「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第二次則為「東亞新秩序」聲明，直到第三次才出現被正式稱為「近衛聲明」或「近衛三原則聲明」的表述。因此，無論是重慶方面或南京方面，在當時所提及的「近衛聲明」，皆應是指今日所稱的第三次近衛聲明。

體形式顯現。<sup>83</sup>

12月29日，汪精衛發出「艷電」，開啟了其所謂之「和平運動」，公開呼籲日本之第二次近衛聲明，已改變第一次聲明的對華態度，並闡明第三次近衛聲明三原則之內容，認為已開啟中日和平談判之途徑。然而，汪精衛並未對作為三原則前提之「東亞新秩序」作出明確表態。和平運動隨後發展為組織新政府，汪精衛期望近衛之後的平沼內閣能堅持實施「近衛聲明」。<sup>84</sup>此新政府並非為取代蔣介石政權，汪精衛與日本方面對此均清楚。汪之目標在於促成蔣介石政權與日本之間之和平，並期望擔任政治仲介角色。<sup>85</sup>為使蔣介石接受和平，汪認為自己必須擁有堅實政治基礎。正因如此，儘管面臨被指責為傀儡政權之風險，汪仍是選擇到南京準備組織新政府，試圖在日方與重慶政權之間維持足夠之自主性，以便推動日中和平談判。緊抓「近衛聲明」並靠攏「東亞新秩序」遂成為其爭取對日自主的重要憑藉。

1939年9月24日，即臨時與維新兩政府人員聯名發表聲明支持汪精衛建立中央政府之翌日，汪精衛致函近衛文麿，信中表示：「乘此邁進，庶幾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得以貫徹，而閣下去冬聲明及弟之響應，當可目睹其實現矣。」<sup>86</sup>同年10月，汪精衛為爭取日本國內輿論支持，在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上刊登〈中國與東亞〉一文。文中提出「中國之求生存獨立自由與建設東亞新秩

<sup>83</sup> 井上壽一，《增補 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頁205。

<sup>84</sup> 例如，汪精衛從河內搭船到上海途中，據影佐禎昭回憶，汪表明如果日本政府同意透過建立和平政府來發展和平運動的方式，希望近衛聲明不僅是日方的表面聲明，而是確切得到落實。如果不落實近衛聲明，汪就難逃被日本欺騙的罪名。重慶也不會信任日本。影佐禎昭，〈曾走路我記〉，收入人間·影佐禎昭出版世話人會編，《人間影佐禎昭》（東京：人間·影佐禎昭出版世話人會，1980年），頁46。

<sup>85</sup> 例如，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的堀場一雄指出：「總軍當局將汪工作的一部分視為對重慶的工作。也就是說，我方對汪方的態度應直接反映給重慶，與汪方的秘密會談實際上就是與重慶的間接對話。我們想傳達給重慶的訊息，會以告知汪方的方式進行。汪方與重慶之間的使者往返是事實，例如周佛海就是最頻繁的代表之一。」堀場一雄，《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東京：原書房，1973年），頁127。

<sup>86</sup> 汪精衛，〈致日本近衛公爵（二）〉，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下冊，頁495。

序，義相一致」，強調中日兩國應共同承擔改造東亞之責任。<sup>87</sup> 然而，他在表達合作意願時，亦提出明確條件：中國「獨立自由」不可侵犯。若日本真欲與中國合作，必須尊重中國主權。此回應一方面展現合作姿態，另一方面試圖以主權論述爭取政治空間與談判籌碼。

汪精衛在〈中國與東亞〉和〈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中指出：三民主義倡導的民族平等、民生幸福，與近衛聲明提出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精神一致，皆為亞洲和平與繁榮基石。汪表示：「就中國而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就東亞來說，三民主義也就是大亞洲主義。近衛聲明的三原則就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sup>88</sup> 此種論述策略旨在融合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為汪政權與日本之合作，提供道德與思想上之正當性，試圖證明其合作符合亞洲整體利益。此構想並非汪精衛一廂情願，日本國內如昭和研究會的知識分子亦有附和，並探討三民主義與東亞協同主義的共同點。<sup>89</sup>

<sup>87</sup> 汪精衛，〈中國與東亞〉，收入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1年），頁53-55；日文題名〈日本に寄す——中国と東亜——〉，刊於《中央公論》，第625號（1939年10月），頁476-480。同期還有周佛海的〈わが和平闘争〉一文。

<sup>88</sup> 汪精衛，〈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收入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頁65-73。這是汪於1939年11月23日對參加日本軍宣傳主任幕僚會議列席軍官們所進行的演講，這場演講是汪少數專門面向日本軍方所作的公開談話之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土屋光芳認為，該演講是在汪日之間「內約交涉」陷入僵局之際，汪精衛刻意藉此機會向日本方面傳達訊息。土屋光芳，《「汪兆銘政權」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考察》（東京：人間の科学新社，2017年），頁132。然而，從制度運作的角度來看，這場演講也可能與汪政權爭取中國淪陷區內日本軍民支持的策略有關，意在促使他們接受三民主義的理念。汪政權成立後，國民政府宣傳部特別設立「中國和文出版社」，定期出版《日文國民政府匯報》。該出版社由日本人擔任負責人與編輯，並將汪精衛的多場演講翻譯為日文刊登，目標讀者正是駐留於中國占領地的日本人。這一宣傳策略顯示，汪政權不僅試圖爭取中國民眾的支持，也積極尋求日本軍民的認同與合作。

<sup>89</sup> 史桂芳與王柯指出：「昭和研究會成員竭力尋找協同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共同點，闡述東亞新秩序與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相一致，說明只有協同主義才能實現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的目的。昭和研究會多次討論協同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問題，認為三民主義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儘管理論上自相矛盾，但是其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史桂芳、王柯，〈從昭和研究會看戰爭中的日本知識份子〉，《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2期（2008年7月），頁57。

然而，汪精衛對日本主導之東亞新秩序並非全然接受。1940年元旦，他在〈共同前進〉一文中進一步明確表達了對新秩序中潛藏不平等之警覺。他認為：「援助與干涉是有極大分別的。援助是培養其能力之發達，干涉則是摧殘其能力之發達。」汪精衛此言明確警告日本，若其所謂之「援助」最終淪為「干涉」，則將導致中國「與日本分離，甚至背道而馳」。<sup>90</sup> 這清晰地揭示，汪精衛對日本主導下之東亞新秩序並非盲目附和，他對這種「新秩序」的實際運作邏輯抱持高度警戒。他追求的提攜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的互助關係，而非殖民統治下之附庸關係。

然而，在現實層面上，汪精衛所期望之平等合作多半最終淪為日本單方面主導之安排。汪政權在外交、經濟與軍事等核心領域，處處受制於日方。例如，在軍隊指揮權、經濟物資供應、政策宣傳等關鍵領域，汪政權之決策權往往受到日本之干預和控制。<sup>91</sup> 學者井上壽一對此認為：「儘管汪精衛多次強調『中日並肩建設東亞和平』，但在實際政治實踐中，汪政權卻被普遍視為日本之傀儡政府。汪政權原本作為「反帝國主義」＝亞洲主義據點的自立性，反而被日本大幅限制。汪政權的結局，也象徵著日本亞洲主義外交的終結。」<sup>92</sup>

汪精衛試圖將自身「中日提攜」之理念納入日本所主張之「東亞新秩序」及後來進一步的「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榮圈）」框架之中。<sup>93</sup> 然而，此種看似

<sup>90</sup> 汪精衛，〈共同前進〉，收入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頁153-156。

<sup>91</sup> 可參閱許育銘著，馮青譯，〈汪精衛政權と日本人顧問〉，《軍事史學》，第52卷第2號（2016年9月），頁28-46；小笠原強，〈汪精衛政權下の日本人顧問：顧問の配置とその影響〉，《專修史學》，第59號（2015年11月），頁1-40。

<sup>92</sup> 井上壽一，《増補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頁216。

<sup>93</sup> 1940年7月26日，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之際，日本政府制定《基本國策綱要》，明確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並將其與國內「新體制」的確立並列為基本方針。相較之下，「東亞新秩序」主要限於日、滿、中三方的合作，屬於區域性構想，強調互助共存、防共與經濟整合，原意在化解中日戰爭，然而未能奏效。而「大東亞新秩序」則擴展至整個東亞地區，強調「共存共榮」與反西方殖民，不僅具更強的戰略性與意識形態色彩，也成為日本推動亞洲主義下的帝國擴張論述。其背後近代日本亞洲秩序構想的演變脈絡，可參閱武田知己，〈東亞新秩序から大東亞共榮圈、そして戦後秩序へ：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新秩序構想をたどる〉，《中央公論》，第136卷第9期（2022年9月），頁34-142。

「整合」之努力，實則充滿了內在矛盾與張力。原因在於，日本軍部及政界人士如木戶幸一，並不承認中國民族主義，亦未將中國視為平等主權國家。在不放棄日本帝國主義既得利益之前提下，其等可主張與中國合作以對抗歐美帝國主義。對其等而言，「東亞新秩序」之構想僅為向日本國民闡釋戰爭目的之權宜之計，最終是為動員全民投入總力戰之重要工具。<sup>94</sup> 因此，汪精衛期望建立一種以亞洲人自我合作為主體之區域新秩序，但其努力最終卻被納入以日本利益為核心之帝國主義設計中，此一理想與現實之巨大落差，構成了汪精衛政治生涯中最根本之困境與矛盾。

## 伍、結語

汪精衛的政治生命幾乎橫跨整個中國現代史最為激盪與變革的時期。他既是晚清時期以身許國的革命志士，也是民國時期的國民黨領袖，更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選擇與日本合作的高度爭議者。回顧其「中日提攜論」的思想歷程與政治實踐，可見他的「投日」選擇並非權宜或投機，而是一套自青年時期建構並隨時代調整的思想體系。

汪精衛的思想可追溯至留學日本時期。他深受明治維新近代化能量與陽明學「志士精神」啟發，將個人犧牲與民族振興緊密結合。巴黎和會失敗與一戰衝擊，使他將激進民族主義轉化為更具普世關懷的「人類共存主義」，以此對抗軍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擴張。

在思想建構過程中，汪精衛作為孫中山思想的信仰者，接受孫中山對日觀的正當性論述，包括孫中山的「亞洲主義」論述。這些早期思想積澱，成為他日後推動「和平運動」的基石，展現出其思想的內在連續性。他並非全然否定抗日，而是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和平派，主張與後者對話，尋求「提攜合作」途徑。

---

<sup>94</sup> 竹田勇吉，〈木戶幸一による東條英機奏請の政策決定過程〉，《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第11號（2010年7月），頁167。

然而，面對全面抗戰的犧牲與國家存亡危機，汪精衛選擇與主流相反的「和平救國」之路，但此非所謂的「曲線救國」。<sup>95</sup> 他透過與日本合作，爭取中國生機，減少戰爭損耗，並寄望將「東亞新秩序」導向「平等互惠」。從制度層面來看，他不僅在言論上倡導合作，更實際推動一系列政策體系的建立，試圖將理念付諸實踐，特別是1940年之後活躍的「東亞聯盟運動」。<sup>96</sup>

汪精衛從1930年代初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最終走向「和平救國」的轉變，始終貫穿著「中日提攜論」的思想主軸。然而，他過於高估日本改變侵略政策的可能性，也低估了自身政權在中國內部所面臨的正當性危機。他未能妥善處理理想主義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得平等提攜最終淪為空談，汪政權也陷入困境。

審視汪精衛，不僅是檢視個人抉擇，更是對20世紀中國與亞洲現代性困境的反思。他的「中日提攜論」展現出一種在極端政治壓力下對和平與民族存續的構想與實踐，雖未能實現理想中的亞洲新秩序，卻留下值得思考的思想遺產。從早期的志士精神與革命理想，到面對戰爭現實所作的妥協，汪精衛始終試圖在大國壓迫與主權困境之間尋找一條替代路徑。

---

<sup>95</sup> 過去常有人將汪精衛投向日本的行動稱為「曲線救國」，並與蔣介石的「直線救國」形成對比。然而，汪精衛本人從未使用過「曲線救國」這個詞。這個說法的流行，其實源於1941年後大量國民黨軍隊投降日軍時的自我辯解。根據蔡德金的研究，「曲線救國」一詞最早出現在1939年6月，由河北民團總指揮張蔭梧在致國民黨當局的電報中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該電報並未提及汪精衛。儘管如此，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大辭海》線上資料庫卻將此詞定義為：「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親日派、頑固派為降日反共製造的藉口。1939年初，由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首先提出，認為汪精衛叛逃非降日乃曲線救國，對其部隊投敵，說成為保存實力施行曲線救國。」這種將詞語起源與汪精衛行動混為一談的說法，實屬張冠李戴，且在相關論述中屢見不鮮，容易造成對歷史的誤解。蔡德金，〈抗戰期間蔣汪關係及所謂曲線救國問題〉，《傳記文學》，第53卷第2期（1988年8月），頁107。

<sup>96</sup> 汪精衛於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40年底起積極推動「東亞聯盟運動」，作為其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具體實踐與對日合作的重要政治工具。透過組織團體、召開會議及展開宣傳活動，汪政權致力於在淪陷區推廣泛亞理念，試圖建構一種以中日合作為核心、排斥西方勢力的地區秩序，以合理化其政權的存在與政策方向。至於該運動的組織架構、實際活動與影響，將於後續文章中詳加探討；而關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參與情形，限於篇幅，亦將另文分析。

他的選擇成為歷史爭議焦點，但思想與行動的連續性，以及對時代危機的回應，使他成為理解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轉折的重要個案。他的提攜構想雖遭軍國主義現實扭曲，但其中所蘊含的亞洲合作、區域自主與和平理想，也是反映出一種試圖跳脫民族國家零和邏輯的另類思考。

綜合而言，汪精衛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實踐者。他的思想演化與政治選擇，提供了一面反映現代中國思想困境與東亞秩序重構嘗試的鏡子。正是這種思想與行動交織下的矛盾與張力，構成了汪精衛歷史形象的多面性與探究價值，也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超越道德二元，轉向更審慎的結構與思想分析。<sup>97</sup> 在此意義上，重新審視汪精衛，或許能讓我們更深刻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以及人在極端困境中尋求抉擇與意義的艱難過程。

---

<sup>97</sup> 史峻在他書中的第九章，專門討論了戰時汪精衛的亞洲主義與汪政權的戰時政治宣傳，結論中提到：「面對當時與敵人合作建立新中國的人，我們不應該硬把自己的道德判斷強加在他們身上，反而要試著脈絡化他們的行為。有鑑於此，戰時的亞洲主義政治宣傳可謂集近五十年來中國亞洲主義論述之大成。就許多方面來說，這也是中國亞洲主義的終點，亞洲主義的概念在戰爭結束後邁入了禁忌塵封期。」這是對汪政權與亞洲主義最具洞察力的評述之一，值得反覆咀嚼。史峻（Craig A. Smith）著，韓絮光、林紋沛譯，《中國的亞洲主義》，頁374-375。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汪兆銘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三）〉。

### 二、史料彙編

-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戰爭》，第2冊。東京：六一書房，2011年。  
張世瑛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補編。臺北：國史館，2015年。

###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千倉豐編，《近衛文麿清談錄》。東京：千倉書房，1936年。  
中央電訊社出版委員會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選集》。南京：中央電訊社出版委員會，出版年不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1年。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市檔案館編，《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何孟恆編，《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文章、演講、書信、電報》，中、下冊。  
臺北：八荒圖書，2023年。
- 汪精衛，《汪精衛先生的文集》，第4卷。上海：中山書店，1929年。
- 近衛文麿，《最後の御前会議／戦後欧米見聞録——近衛文麿手記集成》。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
- 近衛文麿著，高天原、孫識齊譯，《日本政界二十年——「近衛手記」》。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8年。
- 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0年。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5、31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
- 高宗武著，陶恒生譯，《高宗武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
-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
- 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年。
- 愛新翼、西村成雄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Ⅱ》。大阪：法律文化社，2024年。

#### 四、雜誌、報紙

- 《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933-1939年。
- 《中央公論》，東京：1939年。
- 《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 《中央訓練部公報》，南京，1937年。
- 《中央導報》，南京，1943年。
- 《申報》，上海，1931年。

#### 五、專書

- 人間・影佐禎昭出版世話人会編，《人間影佐禎昭》。東京：人間・影佐禎昭出

- 版世話人會，1980年。
- 三谷太一郎，《日本の近代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岩波書店，2017年。
- 三輪公忠，《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一九三〇年代論として》。東京：創世記，1981年。
- 土屋光芳，《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東京：人間の科学新社，2000年。
- 土屋光芳，《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権》。東京：人間の科学新社，2004年。
- 土屋光芳，《「汪兆銘政権」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考察》。東京：人間の科学新社，2017年。
- 井上壽一，《増補 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16年。
- 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東京：論創社，1991年。
-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権》。臺北：國史館，2001年。
- 史峻（Craig A. Smith）著，韓絜光、林紋沛譯，《中國的亞洲主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5年。
- 朱子家，《汪政權の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1959年。
- 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9年。
- 邵銘煌，《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
-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
-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
- 汪文惺，《我書如我師：汪文惺日記（1937-1938）汪精衛與女兒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新北：漢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2024年。
- 汪精衛著，何孟恆編著，《汪精衛詩詞新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9年。
- 沈絨，《和平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出版時地不詳。
- 胡漢民著，王養沖主編，《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廣州：中興學會，1935年。
-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著，吳偉明譯，《日本人與孫中山》。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東京：原書房，1973年。
- 張崑將，《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

- 國史館，1999年。
- 許紀霖，《一個民族的精神史》。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
- 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年。
- 嵯峨隆，《アジア主義全史》。東京：筑摩書房，2020年。
-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及其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22年。
- 楊治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4年。
- 雷鳴，《汪精衛先生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臺北：國史館，1995年。
-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 Taylor, Jeremy E.. *Iconographies of Occupation: Visual Cultures in Wang Jingwei's China, 1939-194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21.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土屋光芳，〈汪精衛の「和平運動」と「大亞洲主義」〉，《政経論叢》，第61卷第2期（1992年12月）。
- 土屋光芳，〈汪精衛研究文献目録〉，《政経論叢》，第90卷第3、4期（2020年3月）。
- 小笠原強，〈汪精衛政権下の日本人顧問：顧問の配置とその影響〉，《専修史學》，第59號（2015年11月）。
- 王奇生，〈抗戰初期的「和」聲〉，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年。
- 王晟旭，〈近年日本有關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現狀評述（2000-2022）〉，《漢學研究通訊》，第43卷第2期（2024年5月）。
- 丘為君，〈邁向烈士之路：青年汪精衛的政治思想〉，《비교중국연구》，第6卷第2期（2025年7月）。
- 史桂芳、王柯，〈從昭和研究會看戰爭中的日本知識份子〉，《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2期（2008年7月）。
- 伊東昭雄，〈「大アジア主義」と「三民主義」——汪精衛政権下の諸問題につ

- いて——」，《橫濱市立大學論叢》，第40卷第1號（1989年3月）。
- 伊原沢周，〈汪精衛と近衛首相：ハノイの滞在とその苦悩〉，《東洋文化學科年報》，第5卷（1990年10月）。
- 宇野重昭，〈広田弘毅の対華政策と蒋介石——自護体外交の限界性〉，《國際政治》，第56期（1977年3月）。
- 庄司潤一郎，〈日中戦争の勃発と近衛文麿「國際正義」論——東亜新秩序への道程——〉，《國際政治》，第91號（1989年5月）。
- 庄司潤一郎，〈近衛文麿に見るアジア主義の変化——中国認識を中心として〉，收入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4年。
- 竹田勇吉，〈木戸幸一による東条英機奏請の政策決定過程〉，《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第11號（2010年7月）。
- 李文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86期（2004年12月）。
- 岩谷將，〈日本陸軍眼中的汪精衛和平運動〉，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年。
- 重光葵、渡辺行男，〈孫文を偲ぶ〉，《中国研究月報》，第487號（1988年9月）。
- 孫宏雲，〈汪精衛、梁啟超“革命”論戰的政治學背景〉，《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2024年10月）。
- 許育銘著，馮青譯，〈汪精衛政權と日本人顧問〉，《軍事史學》，第52卷第2號（2016年9月）。
- 董聰利，〈1938年における松本重治の対華和平工作参与——リベラルの模索と限界——〉，《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第40號（2020年9月）。
- 管美蓉，〈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臺灣文獻》，第66卷第3期（2015年10月）。
- 劉威志，〈汪精衛〈憶舊遊·落葉〉的作意、效用與迴響再探〉，《政大中文學報》，第36期（2021年12月）。
- 劉傑，〈中日關係史上的「汪兆銘研究」〉，收入黃自進編，《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上）》。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年。
- 劉維開，〈孫中山北上與講演「大亞洲主義」的考察〉，收入楊同慧總編輯，《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下冊。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年。

- 蔡德金，〈抗戰期間蔣汪關係及所謂曲線救國問題〉，《傳記文學》，第53卷第2期（1988年8月）。
- 蕭李居，〈變調的國民政府：汪、日對新政權正統性的折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
- 藤井昇三，〈孫文與近代日本〉，《政大日本研究》，第3號（2006年1月）。
- 關智英，〈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收入楊際開、伊東貴之編，《「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互還流》。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年。
- 武田知己，〈東亞新秩序から大東亞共榮圏、そして戦後秩序へ：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新秩序構想をたどる〉，《中央公論》，第136卷第9期（2022年9月）。

## 七、網路資料

- 〈胡蘭成晚年對汪精衛及其南京政府的最後結論〉，收錄於「新世紀」：[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79.html)（2025/7/5點閱）。
- 〈稻盛和夫：要讓中國人明白日本可信賴〉，收錄於「新浪財經」：<https://www.yicai.com/news/3301097.html>（2025/7/5點閱）。